

黑帮杀人埋尸17年,民警追捕奔波6万里

青海扫黑除恶第一大案“日月山埋尸案”侦破纪实

本报记者吴刚、蓝翔

以张成虎、马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,通过金场采金获利施惠,打压排挤竞争对手,攫取经济利益。经二十余年“洗白”,逐步转型,发展成为“以商养黑”“以黑护商”的涉黑犯罪集团。10月30日,青海省“扫黑除恶第一大案”公开宣判。

这起以“日月山埋尸案”为代表的“8·07”涉黑专案,是目前青海涉案人数最多、时间跨度最长、社会危害最大的涉黑案件,也是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案件。

“8·07”专案组自2018年8月成立以来,全国扫黑办、青海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高度重视,省公安厅党委跨地跨部门抽调的300余名精干警力,爬坡过坎,掀起一波又一波强大攻势。

3个多月地毯式搜索

2019年10月7日,海拔3600米的日月山被大雾笼罩。当天,专案组民警在109国道东向西方向33公里处的边坡旁,起获一具人体遗骸。经青海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DNA鉴定结果确认,遗骸系被害人马某珍。

2002年3月,犯罪嫌疑人马海山、王延雄等人经预谋,将被害人马某珍强行挟至西宁市湟中区一片黑刺林附近进行殴打,并向其生意伙伴索要赎金125万元,马某珍乘机逃脱。

一个月后,“8·07”涉黑组织主要犯罪嫌疑人马成伙同马海山、王延雄、马登月等6人,再次将马某珍绑架,挟至湟中区大源一水渠旁,拖拽下后殴打致死。

暮色合拢,载着被害人尸体的皮卡车,途经拉脊山,行驶至日月山垭口附近停下。凌晨一点,远处倒立一级公路的施工车辆正加班进行倒土作业,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尸体抬出,掩埋至路基下后逃离现场。

2019年4月,在侦办“8·07”涉黑专案时,专案组发现被害人马某珍被绑架杀害的线索,随后将这起命案与涉黑案件并案侦查。

“埋尸发生在18年前的夜晚,犯罪嫌疑人对埋尸地点记忆模糊,加之18年间青海倒立一级公路的新建和多次翻新,嫌疑人辨认的埋尸地点各不相同,这对我们寻找尸体非常不利。”“8·07”专案组“日月山埋尸案”负责人说。

“我们专案组民警往返日月山近百次,通过各部门协调、警犬气味鉴别、卫星图和施工图比



▲2019年10月,在“日月山埋尸案”被害人疑似被埋地点,专案组正在寻找被害人尸骸。

新华社发(青海省公安厅供图)

对、走访当时项目分包负责人和多名施工人员逐步缩小范围,最终通过现场勘验找到尸骸,从而打开了专案侦破的突破口,进一步获取了侦破案件的关键证据。”这位负责人说。

苍茫的日月山下,横跨40余公里的疑似埋尸区域,近200名民警,3个多月风餐露宿地毯式搜索,在起获遗骸那一刻,所有在场民警沉吟不语。

“扫黑除恶、匡扶正义”,被害人马某珍家属送来的锦旗上,印着这几个烫金大字。一名专案组民警看到锦旗,没能忍住眼泪,“我们的搜索过程确实艰辛,但看到这几个字,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!”

正义不缺席,邪恶有其报。2001年3月11日,被害人马某德与妻子怎么也没想到,在自家门口会遭遇不测,那天晚上,当两人像以往一样上楼回家时,蹲守在二楼平台的犯罪嫌疑人杨生录用方形铁锹,将马某德妻子打晕在地,马某德向楼下跑时,被蹲守的马成和追上来的杨生录围堵,连砍21刀,手脚筋被砍断……一年后,马某德因肝病去世。

“8·07”专案组负责人介绍,2001年,涉黑组织的主要嫌疑人张成虎,在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麻莱县秋智乡采金,认为同在当地采金的被害人马某德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,遂指使马富录,安排马成和杨生录对其进行殴打。

“让我父亲的惨案得以沉冤昭雪,让扫黑除恶落到实处,是我们老百姓的希望。”被害人马某德女儿含泪说道。

10月30日,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成虎、马成等人以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、开设赌场罪、寻衅滋事罪等10余项罪名,一审公开宣判,数罪并罚,分别判处张成虎无期徒刑,马成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该案其他37名成员,也受到了有期徒刑2年至23年不等的刑罚。

不论时间跨度多长、不管办案难度多大,都要揭开事实真相——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殷殷期盼,是专案组人员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坚定信念,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铮铮誓言。

在厨房暗洞完成最后的抓捕

2020年10月16日,专案组在西宁市湟中区抓获在逃人员马海云。至此,青海“8·07”专案组织成员全部到案。

16日7时28分,“8·07”专案追逃组民警在对马海云亲属家的厨房进行搜查时,察觉到异常。“家中长期无人住,一摸炕头,却有余温。”炕头对面,一张堆放杂物的桌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。拉开围挡布帘,挪开杂物箱,露出一个仅容一人平躺的暗洞。

“马海云当时正缩在洞里。”专案民警对记者说,“那个洞就是他藏匿多日的窝点,平时他躲在屋里,门口一有风吹草动就钻进去。”历时一年多,追捕行程累计3万多公里,足迹远至海南三亚,白天越山岭、深夜守疑处……专案组终于将最后一名团伙成员抓捕归案。

专案组负责人感慨道,“同乡同村同族”是该涉黑团伙的一大特征,“涉案人员多,‘亲戚曾亲戚’,互相包庇窝藏,追捕工作难上加难。”

专案组民警曾冒着大雪,在嫌疑人家门前连续蹲守近20小时。“熄灯以后还要再等等,第二天不亮继续返岗侦查,这些仅仅是追逃工作一些很小的细节。”专案组民警说。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正是专案攻坚阶段。专案组民警冒着被感染的风险,克服疫情带来的不便,赶赴湖北荆州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马成虎。

逃犯虽落网,要想令其认罪服法,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“融冰”之战。据专案审讯组成员介绍,本案犯罪嫌疑人多曾被打击处理的前科人员,深知罪行深重,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,审讯期间表现出很强的对抗心理。

“审讯初期,有的嫌疑人没一句实话,绞尽脑汁跟你打‘游击战’。”专案组民警说,“被问烦了,就对专案组民警直接破口大骂。”

马成落网后,审讯工作一度无实质性进展。抱着“开口闭口都是死”的心态,马成沉默如顽石,闭口不提犯罪行为。

为找出马成“软肋”和“痛点”,审讯组系统了解其成长过程、社会经历和家庭成员,在其“证据册”“时间轴”里寻找作案规律,以事实证据攻心、借政策法律教育、用真诚关心感化……

2019年10月,马成终于首次交代“日月山埋尸案”犯罪行为。

经查,以张成虎、马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敲诈勒索、开设赌场、收取保护费、控制黑车运营、插手民间纠纷等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手段大肆敛财,历经20年,已逐渐涉足酒店、房地产业、道路施工等领域。

“只有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,才能真正做到‘黑财清底’,连根拔除黑恶势力,防止死灰复燃。”专案组民警说。

专案打财组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全链条核查涉案财产流转轨迹,对涉案资产进行详细甄别定性,坚持依法认定、查处涉案财产,做到应查尽查,应扣尽扣。

自成立以来,“8·07”专案组共摸排、征集各类线索220条,立案侦办案件66起,抓获涉案嫌疑人126人。处理好这般庞杂的信息数据,确保侦查、审讯等工作顺利进行,离不开专案组重要的“神经中枢”——材料组。

据材料组负责人介绍,材料组负责对接其余8个组及其下设的24个小组,所有案件线索、证据材料和侦查方向等信息,事无巨细,都须由材料组汇总分析、审核把关。

材料组共13人,整个专案组规模一度超300人,“压力可想而知,但大家异常团结,啃硬骨头的精神非常强。”该负责人说。

杜绝“见黑见恶不见伞”

“8·07”专案组负责人介绍,通过两年多时间,把这个违法犯罪集团彻底打掉,对净化社会环境、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。

青海省纪委监委表示,及时成立惩腐打伞专案组,以双专班的模式,同步推进刑事案件侦办和惩腐打伞,深挖“8·07”案中公职人员涉嫌腐败和保护伞问题,杜绝“见黑见恶不见伞”。

青海省副省长、公安厅厅长王正升表示,这起收网大案要案难案顺利移送审查起诉,离不开全国扫黑办、公安部、省委省政府强有力领导和支持,离不开“双专班”的互通共享、优势互补、攻坚克难,离不开兄弟省市公安机关大力配合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,离不开全体办案人员的忠诚担当和不懈努力。

受访政法专家表示,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遍性、深层次问题,需从法律、政策、制度、机制层面研究解决办法,形成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的长效机制。

编辑刘梦妮

行情好时不让红薯出县,行情差时拒绝托底收购,“公司+农户”变成公司“掐”农户

江苏泗洪:薯农卖红薯为何卖出“薯怨”

本报记者郑生竹、赵久龙

位于江苏省北部的泗洪县,是我国传统的红薯主产区。为让薯农增产又增收,当地以土地入股等方式,与龙头企业合资组建产业联合体,推出保底价收购。

不少村民反映,今年红薯市场行情大幅下行,龙头企业并未兑现保底收购的承诺。而去年红薯市场价高于保底收购价时,当地镇村干部却以限制运输等方式阻止外销。此外,当地不允许薯农自行加工制作淀粉,不少村民对此颇有怨言。

去年不让外销,今年却不来收

“去年是看住我们不让往县外卖,今年是承诺的保底价收购不兑现。”泗洪县红薯种植大户张荣强说,今年开春种植时,当地红苕种植加工龙头企业以1.5元一斤的价格统一派发种苗,并口头承诺用了种苗的种植户,等到红薯上市时,可按照每斤0.35元价格收购。由于今年红薯市场行情下行,一些红薯贩子到地头的收购价不到0.3元,当地龙头企业却不愿托底收购。

薯农张兰种了近9亩红薯,一亩地可以收五六千斤,“龙头企业不来收,放着也怕掉价,只能卖给小商贩了。”

几乎在去年同期,红薯市场行情上扬,周边地区和当地贩子的收购价高于0.35元一斤,不少薯农为每亩地多几百元收益,不愿把红薯卖给当地龙头企业。

为了不让红薯外流,当地出动镇村干部,以压坏乡村道路为由,不允许当地薯农将红薯拉到县外买卖,只能卖给当地龙头企业。一些村民质疑这种做法涉嫌利用行政手段干预、垄断市场。

“我们又不是贩卖毒品,买卖就应该自由。”去年11月,重岗街道余庄村一余姓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很多农户就指着卖红薯讨生活,即使一亩地只能多收一两百元,村民们也不忍心低价卖。

记者走访泗洪县重岗街道看到,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家红薯收购点。红薯贩子韩女士说,每个村庄都有贩子收购,“当地龙头企业不怎么下来收,很多农民把红薯卖给我们,一天能收十多斤。”

记者调查了解到,包括重岗街道在内的泗洪县西南岗地区,多为高平不平的旱地,地力贫瘠,以种植“懒汉作物”红薯为主。这里是全国传统的红薯主产区,不少家庭世代种植。由于红薯行情波动不定,薯农经常增产不增收。

2018年,为帮助分散的薯农抵御市场风险,当地成立了西南岗土地股份合作社联合社,与当地龙头企业——江苏美阳薯业发展有限公司,共同出资组建美阳红薯种植产业联合体。

美阳公司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签订红薯种植销售协议,实行统一种植规划、良种供给、集约管理、价格收购和加工出售,并明确约定红薯保底收购价0.7元/公斤,市场价格高时随行就市。

本应起到价格保护的种植收购模式,在不少



▲10月30日,泗洪县重岗街道余庄一处红薯收购点。本报记者赵久龙摄

薯农看来,并未起到“旱涝保收”的作用。自去年爆出强制薯农买卖事件后,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前往当地核查后发现,限制红薯外销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,已要求整改。

张兰等不少薯农还反映,美阳公司在统一收购时爱打白条,不结现钱,卖完要等好几个月才拿到钱,心里不放心。此外,市场行情好时,美阳公司的收购价并未水涨船高,导致今年不少土地合作社与美阳公司解除了种植收购协议。

去年合作种植面积有3万多亩,今年订立协议的只有6000亩左右。签订协议的确保三毛五每斤收购,没订协议的也不收,但得按照市场价格来收。”美阳公司相关负责人裴永辉回应称,按照公司和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规定,收购时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,耽误了打款时间,但肯定不会赖账。

薯农质疑龙头企业“吃独食”

不少薯农还反映,当地只允许美阳公司制粉,却以环保为由禁止村民私自小作坊制粉。近年来,每到红薯收购季,一些薯农就偷偷自行制粉,而当地镇村干部不断劝阻,双方之间展开一场拉锯战。

“我们这里祖祖辈辈以制粉为副业,现在以环保为由不让做,影响红薯种植收益。”重岗街道余庄村一姓村民称,如果允许制粉,一亩红薯能多收上千元。现在农村畜禽禁养,留守在家的村民

重岗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雪琼表示,有的种植大户直接在田里挖坑制粉,废水直接排放到沟渠里,污染河道。过去他们可以到隔壁的安徽泗县制粉,由于当地已经加强监管,这个通道也关闭了,不少大户因此难以接受。

当地县委办提供的材料称,红薯制粉产生的废水COD、氨氮等污染因子很高,会对河湖水体造成严重污染。随着环保力度加大,小农户加工散乱点已被取缔。美阳公司通过与上市公司广西南宁明博世科水务有限公司合作,已新添一条日处理1800吨废水环保设备,红薯加工废水集中处理后能达标排放。

为民致富的联合体为何村民不买账

当前,“龙头企业+合作社+种植户”的模式正在多地推行。近年来,一批工商社会资本下乡后,对农村产业兴旺起到了促进作用,但有的没有处理好与小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问题,未能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,导致出现“富了大户未富民”“肥了老板瘦了老乡”等问题。泗洪不少薯农选择退出红薯种植产业联合体,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模式面临诸多问题。

“好多农业龙头企业就是因为农民不守契约而倒闭。”在当地负责此项工作的基层干部看来,一些薯农契约精神缺失,是这种种植模式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。行情只要稍微好一点,一些薯农就不守协议,哪怕一斤只高出一分钱,就偷偷卖出去,这导致龙头企业的原料来源得不到保证,从而影响后续加工环节的利润生成。一旦红薯行情走低滞销卖不掉时,很多农户就会去找政府兜底。

而在当地一些村民看来,禁止制粉的老问题没有解决,联合种植模式也未让他们尝到甜头,从而导致合作积极性不高。一些村民还反映,所谓的龙头企业“二次分红”也未发到村民头上。
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,利用行政力量介入买卖行为,反映出这类联合体利益联结机制存在漏洞。农业生产与市场本身有很多不确定性,龙头企业和小农户之间很难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结和分担机制。稳定的利益共享需要龙头企业让利,保证农户旱涝保收,这就要求龙头企业需要雄厚的沉淀资本,提高抗风险能力。

泗洪县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,下一步将加强引导农户和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,探索价格保险机制。

重岗街道办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近期已联系大户、合作社、收购商,将上门设点收购,并计划对因路途遥远造成的运费差价进行补贴。同时,在法律、政策容许范围内,积极帮助薯农实现利益最大化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薯农为化名)

编辑黄海波

记者手记

长期以来,小农户老龄化和兼业化现象突出,他们整体科技文化水平不高,多以分散经营、小规模独立生产为主,这导致农村土地生产率、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“三低”,农民持续增收乏力。

为了解决上述难题,让小农户更好对接大市场,好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。近年来,包括江苏泗洪在内的一些农业大县,相继引进产业化联合体项目。

“致富不致富,老农最有数”。接受采访时,泗洪县不少薯农掰着手指头算算,认为保底收购模式并未起到“旱涝保收”的作用。今年红薯行情大跌,说好的价格保护也未兑现。从将信将疑到失去信心,这是当地薯农对红薯种植产业联合体的心理写照。

有专家表示,有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因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,甚至从“公司+农户”变为“公司+农户”。稳定的利益共享需要龙头企业让利,而不是让农户成为代工,要切实保护农户权益,防止农民利益受到蚕食鲸吞。

脱贫攻坚工程,乡村振兴战略,呼唤着一切有利于乡村发展的生产要素流动。但是,任何时候,助农利农不能跑偏走样,更不能变为坑农害农。“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老乡”,只有让各方真正筑成利益共同体,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才有望开花结果。

一座桥塌了,受阻的是一条康庄大道。如何服务小农户、提高小农户、富裕小农户,是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课题,既要立竿见影的措施,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。

为降低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,泗洪县于去年9月推出小龙虾目标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工程,颇受农民好评。“红薯收购风波”发生后,当地表示加快探索红薯目标价格指数保险,部分乡镇街道计划对外销红薯造成的运费差价给予补贴。相关举措能否落实并取得实际效果,还需假以时日留